

金岳霖与中国实证主义认识论

胡伟希●著

《知识论》一书，反映了二十世纪以来经验主义认识论所达到的水平和

成果，构成了人类认识史上不可跳过的环节。要建立当代中国哲学，必须对金岳霖的认识论思想作出科学的总结。金岳霖提出的一些著名论断是有生命力的。他的所与是客观的呈现说，正确地揭示了感觉内容与对象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他的意念的摹状和规律双重作用说，对于知识经验如何从感性上升到知性这一过程作了具体的说明。



金岳霖与中国实证主义认识论





胡伟希·著

金岳霖与中国实证主义认识论

《知识论》一书，反映了二十世纪以来经验主义认识论所达到的水平和成果，构成了人类认识史上不可跳过的环节。要建立当代中国哲学，必须对金岳霖的认识论思想作出科学的总结。金岳霖提出的一些著名论断是有生命力的。他的所与是客观的呈现说，正确地揭示了感觉内容与对象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他的意念的摹状和规律双重作用说，对于知识经验如何从感性上升到知性这一过程作了具体的说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建平
封面装帧 王申生

金岳霖与中国实证主义认识论

胡伟希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周行联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111,000

1988 年 2 月第 1 版 198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

ISBN7-208-00014-X/B·4

定价 2.05 元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近代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	1
一、中国近代实证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	
二、中国近代实证主义哲学的特点和影响	
第二章 感觉论	32
一、“所与是客观的呈现”	
二、中国近代实证主义的感觉论	
第三章 概念论	51
一、意念的摹状和规律作用	
二、中国近代实证主义的概念论	
第四章 因果论	67
一、“理虽有固然而势无必至”	
二、中国近代实证主义的因果论	
第五章 真理论	85
一、“符合与否是真假底定义”	
二、中国近代实证主义的真理论	
第六章 逻辑与科学方法论	108
一、科学理论是以“得自经验还治经验”	
二、中国近代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	
第七章 中国近代实证主义认识论与传统哲学	134

冯友兰新理学通论·····	涂又光 (260)
冯友兰的境界说·····	范 鹏 (280)
熊十力新唯识论述评·····	许全兴 (298)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	何显明 (332)
金岳霖的知识论刍议·····	杜 渐 (348)
金岳霖本体论思想述要·····	宋志明 (369)
论张岱年哲学思想的形成·····	范学德 (389)

中西文化碰撞之必然趋向·····	王振勋 李志娟 (418)
“五四”后西方哲学东渐及其影响的再认识·····	赵德志 (430)
陈独秀的东西文化观·····	卢敦基 (446)
评张君勱对传播现代西方哲学的贡献·····	吕希晨 (459)
略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和“新生活运动”·····	宋惠昌 (488)
叶青简论·····	高 军 (507)

附 录

中国现代哲学史首届全国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	孙 琰 (527)
中国现代哲学书目选编(1919—1986)·····	张 林 编 (543)
中国现代哲学史主要报刊论文目录索引(1979—1987)	
·····	李振霞 阮 青 编 (568)

编后记·····	(595)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

几乎与西方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相对应，中国近代出现了一个颇有声势的实证主义思潮；它由严复肇其端，中经胡适，直至冯友兰、金岳霖，历经半个世纪而不衰。西方文化的输入，为中国近代实证论思潮提供了酵母和养料，然而，中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又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它的发育受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政治诸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从而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面貌。

一、中国近代实证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

1. 严复——中国的第一代实证论者

黑格尔说，任何哲学都是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的表现。中国近代实证论哲学发轫于维新运动时期，就其实质而言，它是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相联系的。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夹缝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这个新生的阶级出生不久便不得不同时肩负起挽救民族危机和反对封建主义的双重任务。在

维新运动中，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同时从西方输入进化论和实证主义哲学，作为抗侮救亡和反封建的主要思想武器。

严复留学英国，正当实证主义思想在英国广泛流播之时，出现了斯宾塞、赫胥黎、穆勒等著名的实证主义思想家。严复阅读了他们的著作，思想上接受了实证主义的洗礼，并把它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很自然的。然而，严复介绍的实证论哲学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发展成为一个思潮，这显然有更为深刻的现实的原因。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要求结束封建专制统治，在经济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而且表现在文化上要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思想、新观念代替传统的思想和观念，一句话，要以西学代替中学。

严复的“西学”指什么？它不单是西方的自然科学，还包括西方的社会科学，而且主要指获致这些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他反对洋务派将西学仅仅理解为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的狭隘看法，指出西方“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论世变之亟》）严复既然将科学的认识方法和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同视为西方富强之本，他在介绍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等学术名著时，就不仅仅局限于这些学科的内容本身，而且往往通过序言、案语以及其他议论文字从方法论角度对这些著作加以评述。在《天演论·序》中，他指出归纳和演绎二者乃“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他称颂达尔文《物种探原》一书“证阐明确，犁然有当于人心”，斯宾塞的群学，“其论一事，持一说，必根据理极，引其端于至真之原，究其极于不循之效。”（《原

强》)总之,无论是自然科学——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还是社会科学——斯宾塞的群学,所采用的无不是从广泛收集事实材料然后归纳出普遍性知识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

根据他对西学的理解,严复把西方实证主义的方法概括为“实测内籀之学”。所谓实测,是以事实观察和实验作为一切知识的出发点和评价标准。他说西方“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原强》)“夫理之诚妄,不可以口舌争也,其证存乎事实。”(《原富·译事例言》)所谓内籀,就是归纳的方法。“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也。”(同上)他认为,一切知识来自对事实的归纳。“公例无往不由内籀,不必形数公例而独不然也。”(《穆勒名学·部乙》案语)

严复将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归结为实测内籀之学,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特征。但是,这种方法论原则是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支配的。实证主义将知识局限于感觉经验的范围,从而对外物的存在持否定或怀疑的态度。这种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既贯穿于严复翻译的赫胥黎、斯宾塞、穆勒等人的著作中,亦存在于严复本人的哲学思想中。

即以当时影响最大的《天演论》而言,赫胥黎在书中叙述了从植物界到动物界,直至整个天体宇宙的进化过程,强调了一切皆动、一切皆变的变化发展的观点,同时,他又认为物质性的实体是否存在是不可知的。因此,宇宙万物归结为各种现象的共存和流传。严复相当欣赏这种不可知论的观点,称赞说“所论观物之理,最为精微。”(《天演论·真幻》案语)又说,“然而谈理见极时,乃必至‘不可思议’之一境。既不可谓谬,而理又难知,此则真佛书所谓‘不可思议’,而‘不可思议’一言,专为此设者也。”(《天演论·佛法》案语)

穆勒的《穆勒名学》是实证主义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代表作，他在书中反复阐述了外物乃“同时毕现之丛感”这么一个基本观点，于是“人心于物，所谓知者，尽于觉意；至其本体，本无所知，亦无由知。”（《穆勒名学·部甲》）严复很称道这个思想，认为是“释氏一切有为法皆幻非实真诠，亦净名居士不二法门言说文字道断的解。”（《穆勒名学·部甲》案语）

严复介绍和接受的不是西方某个实证主义哲学家，而是整个英国的实证主义思想体系。当然，在介绍某个实证论哲学家的著作时，严复的着重点是不同的。例如，他介绍了赫胥黎的进化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穆勒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等等。但所有这些思想理论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论的基点：将人的认识局限于感觉经验之内，这同样是严复哲学思想的基础。在《穆勒名学·部甲》的案语中，严复叙述了中西方哲学史上对“本体”问题的讨论，然后对他本人的观点作了清楚的说明。他说：“窃尝谓万物本体虽不可知，而可知者止于感觉。”他同意斯宾塞将世界划分为现象界和不可知世界的看法，认为一切知识仅仅是关于现象界的知识。因此“是域而外固无从学，即学之亦于人事殆无涉也。”（同上）否认“本体”可以认识，不是严复偶然的、零星的思想，而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他在不同场合下一再发挥这个观点。如《天演论·佛法》一节，严复在案语中对“不可思议”一词的意义详加讨论。他说，“不可思议”就常识或经验的说法，指不可理解者，而哲学上使用“不可思议”一词，乃指现象界背后的“本体”是经验和人的认识无法达到的。象“天地之始，造化真宰，万物本体”等等，总之，一切属于本体论讨论的范畴，在他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

严复承认本体不可知，其哲学基本倾向属于实证主义是毋

庸置疑的。问题在于：是否由于严复介绍的是西方的实证主义，就降低了他的思想的启蒙意义？回答是否定的。作为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广泛流传于西方的思潮，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是法国人孔德，但它却主要继承了英国经验论哲学的传统，即重视实证和观察。实证主义哲学注重科学，十九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发展的成果在实证论哲学中都得到反映，并由此导致它对科学方法论的重视。尽管西方实证论哲学在“尊重科学”的旗号下有以实证的方法反对唯物主义的一面，但其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思想中仍有不少合理的因素。严复在维新运动中介绍西方实证论哲学，完全是针对封建旧学的。他在谈到西方实证论哲学的经验论传统时说，西方“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焉。”（《原强》）他在谈到西方实证论哲学的方法论时说，西方格致之学“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然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原，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迨夫施之民生日用之间，则据理行术，操必然之券，责未然之效，先天不违，如土委地而已矣。”（《救亡决论》）反观中国，“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致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材，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原强》）虽说传统旧学有什么科举八股、汉学考据、宋学义理，名目繁多，不一而足，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不实验于事物”，“不察事实，执因求果，先以一说，以概余论。”是

“无用”“无实”之学。他痛斥这种学术“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救亡决论》）严复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批判封建旧学，是前无古人的。他将西方实证论哲学概括为“即物实测”之学而与中学对立起来，这在当时显然具有反封建的社会意义。

2. 胡适与“五四”前后的实证主义思潮

自严复提倡以后，西方实证论哲学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1903年前后，梁启超发表“西儒学案”，介绍了霍布斯、笛卡儿、洛克、康德等西方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家的思想，加深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实证论思想源流的了解。后来，王国维经过对西方哲学的长期钻研，得出了“可爱者（指叔本华、康德哲学）不可信，可信者（指实证论哲学）不可爱”的结论，而潜心于中国古史的研究。罗振玉说王国维的治学“其术皆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实质上是贯穿了实证主义的归纳方法和怀疑精神。他的“由博以反约”的方法，是广泛收集事实材料，不仅是书上文献，还包括地下彝器，“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即所谓“二重证据法”，务求事实可靠，然后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他的“由疑而得信”的方法，是不敢轻信，如说：“于诗通晓十之八，于书通晓十之五”，既勇于假定，如高祖为帝馨之证实，又能勇于修改假定，如“土”字在卜辞中的解释，开始疑为“国社”的“社”字，后来断定为“相土”的“土”字。总之，一切结论来自对事实材料的归纳。这种方法不仅是对西方实证主义方法的吸收，而且是对乾嘉学派“实事求是”方法的继承，它实际上开启了将中西方学术方法相结合的先河。到了五四时期，由于胡适对西方实用主义的介绍，并将实用主义的方法论与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相互沟通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方法论原则，中国近代实证主义也就以它对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重视

而瞩目于世，它与唯意志论并足而立，成为中国近代哲学的一大思潮。

二十世纪初叶，实证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扩展到欧美各国和其他许多地区，并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流派。胡适早年留学美国，跟随实用主义的大师杜威学习，回国以后写了《实验主义》等许多介绍实用主义的文章。与此同时，丁文江、王星拱等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实证主义的嫡系——马赫主义的主张。接着，由于杜威、罗素的相继来华和在华举办哲学讲座和讲演，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各种流派——实用主义、马赫主义和新实在论在中国遂得以流传。然而，在当时各种实证主义流派中，影响最大者数胡适提倡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的创始人是皮尔士，虽说皮尔士提出的实用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以后为詹姆士、杜威所恪守，但三位哲学家的思想并非完全相同。皮尔士的实用主义的主要目的，在于对概念的意义从实用的功效的观点去理解，以便澄清概念的用法。又由于他对逻辑的看法与逻辑实证论者接近，而被后来的逻辑实证论者尊为自己学派的先驱人物。詹姆士是富于宗教感情的哲学家，他力图从实用主义的原则对宗教信仰作出说明，因此他的哲学富有形而上学气味。但他同时又强调对真理作认识论上的功利主义的理解，而在这点上与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者如穆勒更为接近。至于杜威，则是以实用主义阐明伦理学的哲学家。在方法论上，他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将思想看作为解决“疑难情景”而发展的过程。在真理观上，他批判詹姆士以主体作为检验的标准，而返回到皮尔士的更为社会的和公众化的实用主义立场。总而言之，皮尔士、詹姆士、杜威三位实用主义哲学家，虽就其思想总体来说与实证主义相通，但彼此与实证主义的接触

点有所不同。胡适自称介绍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实际上他从实证主义的立场上对西方的实用主义作了一定程度上的匡正。首先，他强调的是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相同方面。他把达尔文和赫胥黎同视为实证主义的不可知论者，说：“达尔文与赫胥黎在哲学方法上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们的‘存疑主义’。”（《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他认为，从达尔文、赫胥黎到斯宾塞，他们的实证主义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拿证据来。从这里直接演化出实用主义。第二，胡适对西方实用主义作了不同的取舍，而取舍的标准仍依据实证主义的原则。例如，他强调实用主义只是一种方法论，是皮尔士所说的“科学试验室的态度”。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宗教气味过重，遭到胡适的批评，他说：“詹姆士是富于宗教心的人。他虽是实验主义的宣传者，他的性情根本上和实验主义有点合不拢来。”（《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而这所谓“合不拢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詹姆士“反对赫胥黎一班人的存疑主义”（同上）。伦理哲学在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但胡适仅强调杜威实用主义的方法论方面。他说：“杜威始终只认实用主义是一种方法论”（同上）。其实，西方实用主义到了杜威，已经发展为包括本体论、认识论、伦理观、宗教观等的庞大思想体系，而胡适则突出它的方法论的方面。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哲学只是一种方法论，因此尽管詹姆士的“淑世主义”很合胡适的口味，并成为他的社会改良思想的理论来源，他仍将这种“淑世主义”从实用主义中分割出来，与西方其他个人主义思想相结合，提出一种“易卜生主义”，作为反封建和要求个性解放的口号。

不少论者已经指出，胡适的方法论不是西方实用主义的简单翻版，而是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同乾嘉朴学方法的结合。胡适对

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予以很高评价，他说：“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这所谓科学的精神，其实就是重视实证和讲求归纳方法。但胡适将严复以来视实证方法为“即物穷理”或“实测内籀”的说法大大推进了一步，即提出“假设”的重要。他在谈到乾嘉学者考据方法的“根本观念”时肯定“每立一种新见解，必须有物观的证据。”“举例作证是归纳的方法”。但同时指出“汉学家的归纳手续不是完全被动的，是很能用‘假设’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后来，他进一步把清代学者的这种治学方法归结为“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两点。他认为，这两点与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是一致的。他在谈到杜威论思想的“五步说”时指出：“杜威一系的哲学家论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设’。”（《实验主义》）

胡适不仅在综合中西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实用主义方法论的看法，还将这种方法论原则运用于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的研究，例如他对小说《红楼梦》的考释和神会和尚的事迹的研究。贯穿这种“整理国故”的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而其方法论核心，仍是寻求证据的实证原则。他说：“科学态度在于抛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事实走。”“没有证实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在寻求证据和证实方面，胡适结合“国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法，如“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材料的整理与解释”（《胡适的自传·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对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补充和发展。但总的说来，这些方法还停留在证据材料的收集阶段。他批评乾嘉学者在整理“国故”上“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同上）。但胡适提出的这些方法基本上没有超出实证主义

的范畴，同样有局限于事实材料的整理而忽视理论思维的倾向。

3. 实证主义的分化——冯友兰和金岳霖

中国近代对西方哲学的态度经历了维新运动时期有选择的介绍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规模引进的阶段，终于从了解西方哲学到融会吸收，进而建造自己的体系。中国人从自己的研究出发，自抒哲学学理、自创哲学理论是从三十年代开始的，到了四十年代，不仅西方的各种哲学理论，如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生机主义、尼采主义、唯物辩证法都已经输入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学派，而且由于重视用西方的观点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学术中的哲学思想又得到了发扬。在这近代各哲学学派争鸣的时期，实证论思潮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又形成和分化成不同的派别。这时期受实证主义思潮影响的中国哲学，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倾向：第一，从对传统逻辑的研究转向数理逻辑的研究。自严复介绍穆勒名学，提倡归纳逻辑以来，形式逻辑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章太炎、王国维、胡适沿着严复开创的道路，推进了对传统逻辑（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和穆勒的归纳逻辑）的研究，三十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对西方实证主义的介绍，研究数理逻辑的颇不乏人，著名者有俞大维、金岳霖、万卓恒、沈有鼎、汪奠基、张荫麟、王宪钧、胡世华等。其中尤以金岳霖 1938 年出版的《逻辑》一书对罗素的数理逻辑的介绍最为有名。第二，对西方逻辑实证主义思想的系统介绍。一般将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视为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嫡传——第三代。当石里克创立维也纳学派不久，这学派的一些观点即由早年介绍过罗素思想的张申府作了介绍，但对逻辑实证主义思想作系统介绍的是洪谦。洪谦曾是石里克的学生，回国以后以介绍、宣传石里克的哲学为己任。他写的《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

阐述了维也纳学派的主要哲学观点，指出维也纳学派采用逻辑分析方法，通过语义分析确定有意义的命题和无意义的命题；玄学命题是无意义的命题，因而不属于知识的范围。第三，从实证主义思想出发构造哲学体系。随着对西方实证主义各派哲学的了解，中国近代一些哲学家开始借助西方实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融汇传统思想，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其中最著名的是冯友兰和金岳霖。

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发表“贞元之际所著书”（《新原道》、《新理学》、《新知言》、《新原人》、《新事论》、《新事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冯友兰早年留学美国，接受了新实在论的影响。新实在论哲学就其主要倾向来说，与老实证主义、马赫主义一脉相承，立足于唯心论的经验论，并且强调逻辑分析方法，力图用逻辑推论和逻辑分析的原则来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但新实在论又承认共相的独立存在，因此具有柏拉图的和中世纪的唯实论的特点，同时，又承认外部世界和人的认识对象的实在性，表现出一些唯物论的因素。总之，新实在论表现出折衷主义的性质。但冯友兰则将新实在论与中国的程朱理学相结合，建立了以“理”为中心范畴的形而上学体系——“新理学”。他说：“自实际之观点说，各类事物所依照之理，是其类事物之完全典型，是我们用以批评属于其类之事物之标准。”又说：“一切底理，本来即有，本来如此，因某种实际底事物之有，我们可知某理之有，但某种实际事物之无，我们不能因此即说某理之无。反过来说，如无某理，我们可断定必无某种实际底事物，但有某理，我们不能断定即有某种实际底事物。”（参见《新理学第二讲，可原，冯友兰的“理”，相当于柏拉图的“共相”。他实际上是认为有先于和可以离开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理或共相。这已经离开了新实在